

---

# 大學生背後批評行為之跨文化研究

黃寶欣、張佩雅、鄭嫻嫻<sup>1\*</sup>

---

##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檢測文化是否影響大學生的背後批評行為。共有 212 位來自集體與個人主義文化的大學生參與研究。結果發現文化確實影響個人的背後批評行為。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大學生比個人主義文化的大學生，更常以背後批評解決人際衝突。背後批評行為的原因是為了建立關係、避免被同儕排擠，以及掌控關係的主導權。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大學生比個人主義文化的大學生更常為了建立關係、避免被同儕排擠，以及掌控主導權而在背後批評同儕。

**關鍵字：**集體主義/個人主義文化、背後批評行為、間接攻擊、關係攻擊、禮貌理論、面子協商理論

---

\*黃寶欣、張佩雅就讀於慈濟大學傳播學系。鄭嫻嫻為慈濟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亦為本文通訊作者。鄭教授的聯絡方式為:E-mail: chengchuan@mail.tcu.edu.tw

## 壹、緒論

許多先前的研究發現，人際關係的困擾是大學生生活壓力的主要來源之一（江承曉、沈姍姍、林香寶、林文森，2000；劉玉華，2004）。而人際關係的衝突是大學生最大的人際關係困擾之一（劉玉華，2004）。衝突是一種言明或未言明的人際掙扎過程，起因於兩個個體的價值、規範、目標或互動模式不同，甚至是利益、資源分配或面子問題導致的情感挫折情況(Ting-Toomey & Oetzel, 2001)。面臨衝突的情況，每個人所會採取的因應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有人可能採用直接(direct aggression)的方式攻擊對方，例如，以肢體的直接攻擊方式；也有人可能採用間接攻擊(indirect aggression)的方式(Forbes, Zhang, Doroszewicz & Haas, 2009)。間接攻擊是透過有意圖的社會操弄(social manipulation)、控制或毀損他人的社會關係等迂迴方式來傷害特定對象，使受害者因社會關係而受操縱或被擾亂，導致社會聲望受損或是遭受社會排擠而受苦(Archer & Coyne, 2005；Crick, 1996；Lagerspetz, Björkqvist & Peltonen, 1988)。至於個體在何種情況下會使用直接攻擊，在何種情況下會使用間接攻擊，可能受到自我概念（林君徽，2006）、性別(Vail, 2002; Forbes, et al., 2009)或是文化的影響(Forbes, et al., 2009；French, Jansen & Pidada, 2002)。

Crick 與 Grotpetter(1995)指出一種間接攻擊方式稱之為關係攻擊(relational aggression)是以間接的攻擊形式，經由破壞對手的友誼網絡或是隸屬感作為報復的手段。常見的方式包括，蓄意的把一個人孤立在同伴之外，藉此傷害他；或是散播有關此人的謠言，讓團體的成員排擠他；或是蓄意接納他，藉此控制他(Crick & Grotpetter, 1995)。而這種間接的關係攻擊，是攻擊者以迂迴的方式，利用第三者為工具來攻擊他人；透過有意圖的社會操弄和控制，來毀損他人的社會關係；或是藉由左右、操縱他人的人際關係，採取社會排斥行動；或是散播謠言、擾斷他人的友誼、撤銷友誼來傷人(Crick, 1996；Lagerspetz, et al., 1988)。常見於青少年的關係攻擊方式包括，說他人閒話，散播一些謠言或重傷對手的閒話，使他人故意疏離，並冷淡對之；搬弄是非、操弄團體中的人際關係；

在背後罵人或是說一些對對手不利的事（王明傳、雷庚玲，2007）。透過間接攻擊可以降低被發現與被報復的風險(Björkqvist,1994; Warren, Richardson, & McQuillin, 2011)，攻擊者可以隱藏在人群之中而不被發現身分，甚至是若無其事的繼續和對手相處（王孜甯，2008）。間接攻擊其實是很難觀察出，也很難確定的(Toldos, 2005)。也因此，間接關係攻擊一直伴隨在我們的求學過程（王孜甯，2008）。間接攻擊行為是屬於段數比較高的(advanced)攻擊行為(Björkqvist, 1994)。隨著年齡的增加，學童使用直接攻擊的可能性會減少，使用間接攻擊的機率增加；因為間接關係攻擊需要借重成熟的語言能力(Björkqvist,Lagerspetz & Kaukiainen,1992)。因此，相較於學童，間接關係攻擊行為也較普遍存在於青少年(Björkqvist, et al.,1992)。大學階段為青少年後期，是建立人際關係的重要階段（黃玉，2000）。因此，相較於其他青少年階段，關係攻擊應該較普遍存在於大學階段。

而間接關係攻擊的相關研究大多著重在探討性別差異對關係攻擊的影響(林君徽，2006；王明傳、雷庚玲，2007；Björkqvist, 1994；Toldos,2005)，間接關係攻擊對於不同年齡層的影響（唐雅琳，2009；王孜甯，2008），以及文化對關係攻擊的影響(Toldos, 2005; French, et al.,2002；Forbes, et al.,2009)，對於產生關係攻擊行為的原因較少探討。而且研究也較著重在學童（張素秋，2008; 林君徽，2006）與青少年的前期(王明傳、雷庚玲，2007; 2008)，僅有少數探討青少年後期的大學階段（唐雅琳，2009；王孜甯，2008）。大學階段為青少年的後期（黃玉，2000），處於成年初顯期，是個體從學校環境轉換至工作環境的蛻變期，在自我統合與發展之際，學習與同儕和社會磨合的階段（王孜甯，2008）。此時期若能與同儕有良好的互動，並建立親密的友誼關係，有助於其成熟期的人際關係發展（黃玉，2000）。而關係攻擊行為是困擾大學生人際關係發展的問題之一（王孜甯,2008）。因此，探討影響大學生關係攻擊行為的因素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而在眾多的關係攻擊方法中，背後批評最常發生在大學生的生活當中（唐雅琳，2009），卻是較少被學者討論的研究議題。而導致背後批評行為原因有很多，文化可能是主要因素之一(Toldos, 2005; French, et al., 2002)。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

要探討文化對大學生背後批評行為的影響，以及導致背後批評的原因。

## 貳、理論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目的是要檢視來自不同文化的大學生使用背後批評來面對同儕衝突的情況是否有差異。背後批評是一種間接的關係攻擊行為，也是個體用於因應人際衝突的方法。探討文化、批評和衝突因應相關的理論有文化差異層面理論(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 Hofstede, 1983; 2001)、禮貌理論(Politeness Theory, Brown & Levinson, 1987)與面子協商理論(Face Negotiation Theory, Ting-Toomey, 1985)。而禮貌理論與面子協商理論都是以論述個體維護面子的行為，因此統稱為面子理論。本研究將以文化差異層面理論的主張為主，面子理論為輔，來探討文化對背後批評行為的影響，並經由探討的過程來發展研究假設。

### 一、文化差異層面理論

美國學者 Hofstede(1983;2001)的文化差異層面理論是最廣為人知的文化間傳播理論之一。Hofstede(1983;2001)調查了 50 幾個國家的文化，發現可以約略將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分為四個層面，分別為權力距離、不確定性容忍度、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以及陽剛文化/陰柔文化。雖然這四個文化差異的層面都可能影響背後批評的行為，過去的研究建議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文化差異層面是影響關係攻擊的最重要因素之一(Forbes, et al., 2009)。因此，本研究先初探性的將研究重點放在此層面。

#### (一) 集體主義文化

Hofstede(1983)認為集體主義文化是指「一個文化對團體認同(group identity)重視的程度超過個人認同(individual identity)，對團體權利的重視超過個人權利，對團體需求的重視超過個人的需求」。因此，在集體主義的文化裡，集體的利益凌駕於個人之上，強調集體的認同(group identity)與共識;從出生起，個人即被整合在強大，有凝聚力的群體中(Hofstede, 1983; Triandis, 1995)。通常在集體主義社會裡，個人會被認為是歸屬於大家庭或是大宗族的組織中。團體也會以「我們」為中心，

重視個人對集體規範的服從(conformity)與合作，因此鼓勵犧牲個人利益以成就集體的目標；而個人的成就更是由對團體的貢獻來決定，所以團體會保護每個人以交換大家對集體的忠誠(Hofstede, 1983; Triandis, 1995)。在這樣的集體主義文化裡，有時也必須兼顧其他團體，包括組織與延伸家庭，例如，自己與父母的兄弟姊妹，以及相關的親屬；在這樣的社會當中，人際關係的發展更傾向於長期關係(Hofstede, 1983)。像是學長姐制、校友的關係，不論是求學期間或是畢業後的就業，都是彼此互相照顧一輩子。對於這些來自自己團體的人，便是自己人，其他團體的人，通常被視為外人。自己人有義務要彼此照顧，也可以享受關係所帶來的便利。也因此對待自己人與外人使用明顯不同的標準(Hofstede,1983; Triandis,1995)。在集體主義的文化裡，由於強調的是社會和諧與平順的人際關係之維繫、對共享的社群全心投入(French, et al., 2002)，自然而然一切目標都會以團體為主(Triandis,1995)。也因為強調要維繫社會和諧與平順的人際關係(Forbes et al., 2009)，所以需要避免外顯的人際衝突，在面對面的人際行為上更要保持和諧(黃曬莉，2005)。也因為盡量避免正面公開的衝突，因而可能會使用間接的關係攻擊，而背後批評是較常被使用的方式之一 (French, et al., 2002)。

## (二) 個人主義文化

Hofstede(1983)認為個人主義文化是指「一個文化對個人認同(individual identity)重視的程度超過團體認同(group identity)，對個人權利的重視超過團體的權利，對個人需求的重視超過團體的需求」。就個人主義而言，在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鬆散的，因為重視個人的時間、個人的行動自主權、鼓勵以競爭的方式來追求個人成就，例如，權力、快樂、物質的成就(Hofstede, 1983)。強調的是個人目標，甚至在團體中講求獨立生存的精神(Hofstede, 1983; Triandis, 1995)。在這樣的個人主義文化，傾向於以相同的標準對待所有的人，認為每個人都是平權的；也因此沒有明顯的區分自己人與外人(Hofstede, 1983; Triandis, 1995)。然而大部分的個人主義社會是比較鬆散的，因為大多只關注自己或和自己有關係的直屬親屬，例如父母與子女；在這樣的社會，人際

關係的發展通常是短程的關係，是為了暫時的目標才會緊密結合的(Hofstede, 1983)。例如，同學之間只是一起修課，如果沒有發展出深厚的友誼，畢業就各自沒有關聯，也沒有彼此照顧的權利義務關係與人情壓力。也因為個人主義文化強調個人自主與獨立性，鼓勵個人為自己的權利而戰，不需牽涉個人情感；所以他們大多比較能接受公開的衝突與直接的攻擊方式(Forbes, et al., 2009)。

## 二、面子理論

有關人際互動與面子的理論，較著名的是禮貌理論(Politeness Theory)與面子協商理論(Face Negotiation Theory)。禮貌理論是美國學者 Brown 與 Levinson(1987)以西方的文化視角來探討人們如何以禮貌來處理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face threatening acts)。而面子協商理論的主張是建立在禮貌理論之上，再加以延伸，使其更適於解釋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以下將討論禮貌理論與面子協商理論的基本主張，以及理論與背後批評行為的關聯。

### (一)禮貌理論

禮貌理論(Brown & Levinson,1987)的主要論述是解釋禮貌行為在溝通表達上所扮演的角色。禮貌行為是用來減緩因為言語動作(speech acts)所帶來的、可能損傷面子(face)的情況。面子是個體在公眾面前想為自己爭取的個人形象。每一個體都想擁有兩種面子:積極面子(positive face)是希望得到別人的讚同、喜愛、欣賞和尊敬；消極面子(negative face)是不希望別人強加於自己，自己的行為不受別人的干涉或阻礙，保有自己選擇行動的自由。Brown 與 Levinson(1987)認為這兩種面子普遍存在於各種不同的文化。因為禮貌理論的論述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礎上，許多學者曾質疑其跨文化普遍性的問題，例如 Mao(1994)認為消極面子(negative politeness)並不存在於中國文化。隨後許多學者(e.g., Yuan,2013; Hahn & Hatifield,2011)經由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省視禮貌理論之後，以實證研究證明其確實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根據 Brown 與 Levinson(1987)，損傷溝通雙方顏面的言語動作稱作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face threatening acts)，包括道歉(apologies)、告白(confessions)、承諾(promises)、批評(criticisms)、建議(recommendations)與要求(requests)。禮貌理論提出五種策略可以用來減緩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以批評(criticisms)為例，五種策略按禮貌的程度，由高到低分別為下列的排序。(1)「不執行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do not perform the act)」，也就是不批評或不當面批評。(2)「間接執行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go off-record)」，也就是以間接迂迴的言論當面批評對方。(3)「積極禮貌(positive politeness)策略」是想辦法維護積極面子，也就是保護對方的形象。(4)「消極禮貌(negative politeness)策略」是想辦法維護對方的消極面子，也就是不強加限制對方的自由。(5)「直接執行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bald on-record)」，例如不考慮面子問題直接當面批評。

以禮貌理論(Brown & Levinson, 1987)的五個禮貌策略而言，與背後批評行為相關的策略有上述的 1、2 與 3 等三種禮貌策略。背後批評行為是一種以「不執行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do not perform the act)」來迴避正面衝突，目的是避免公開傷害對方或彼此的積極面子(positive face)，以及雙方的關係。「間接執行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go off-record)」是以間接迂迴的言論當面批評對方。而背後批評是在被批評者不在場的情況下，在第三者面前執行威脅被批評者面子的言語行為。因此，背後批評行為其實是類似，但更超越「間接執行威脅面子言語行為」。雖然這樣做的目的都是為了維護被批評者的積極面子，但是背後批評僅止於表面上。

## (二)面子協商理論

面子協商理論(Face Negotiation Theory)最初是由文化間傳播學者 Ting-Toomey(1988)所提出的，用於解釋不同文化的成員處理人際衝突的方式是如何受到面子(face)考量的影響。該理論結合文化層面和個人層面(self-construal)的特徵來解釋面子問題、衝突形式和維護面子的行為；衝突因應過程也是面子協商的過程(Ting-Toomey, 1988)。根據 Ting-Toomey(2005)，面子協商過程所用的方法稱為面子策略(facework)。

所謂面子，根據 Ting-Toomey 與 Kurogi(1998)，是個體在各種社會互動過程需要呈現的正面形象。面子可以分為三種，「自我面子(self-face)」、「他人面子(other-face)」與「彼此面子(mutual face)」。所謂「自我面子」是指個人在衝突過程關心自己的自尊或形象；「他人面子」是關心衝突對方的自尊或形象；「彼此面子」是關心衝突雙方的自尊或形象，甚至是雙方的關係(Ting-Toomey & Kurogi,1998)。「面子策略(facework)」是特定的語言或非語言行為，個體用來維護面子或修復失面子的策略(2005)。「面子策略(facework)」是用來解決、迴避或加重衝突，威脅、挑戰或保護個體的形象(Ting-Toomey & Oetzel, 2002)。「面子策略」是超越衝突因應策略；衝突因應策略是單純以解決實際的衝突為目標，「面子策略」還包括處理身分認知、關係與實際的衝突(Ting-Toomey & Oetzel,2002)。

不同文化的成員處理人際衝突的方式會有所差異，是因為每一個文化的成員需要不同層面的面子(Ting-Toomey & Kurogi, 1998)。Ting-Toomey 與 Kurogi (1998)認為集體主義文化的成員傾向於注重關係的與過程的解決衝突策略，而個人主義文化的成員則傾向於注重獨立的與結果的解決衝突策略。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人傾向於使用他人導向(other-oriented)或彼此導向(mutual-oriented)的策略保留或維護面子，例如「迴避的面子策略(avoiding facework)」，以較間接的方式解決衝突；而來自個人主義文化的人則傾向於使用自我導向(self-oriented)的策略，例如「支配/競爭的面子策略 (dominating/ competing facework)」，以較直接的方式解決衝突(Ting-Toomey, 2005)。而背後批評行為是一種「迴避衝突的面子策略(avoiding facework)」。因此，面子協商理論的主張有助於解釋文化差異對背後批評行為的影響。

### 三、文化與背後批評行為

根據面子協商理論(Face Negotiation Theory, Ting-Toomey, 2005)，人際衝突的過程是一種高度情緒困擾，以及威脅雙方顏面與自尊的現象(Ting-Toomey, 2005)；因此，在各種溝通的狀況中，各種不同文化的成員都會設法維持與協商面子。在個人主義的文化重視個人的自主性，比



較以自我為中心，強調對自身以外的人給予尊重(Hofstede, 1983)。因而來自個人主義文化的人傾向於使用自我導向的策略來保留或維護面子(Ting-Toomey & Kurogi, 1998)。反之，在集體主義的文化裡，由於強調的是社會和諧與人際關係之維繫(French, et al., 2002)。因而，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人則傾向於使用他人導向或彼此導向的策略保留或維護面子(Ting-Toomey & Kurogi, 1998)。在集體主義的文化裡，因為注重社會和諧，會盡量避免公開的衝突(Forbes, et al., 2009)，所以背後批評成為一種宣洩不滿情緒的方式(French, et al., 2002)。這和個人主義所強調的個人自主性，可以面對面理性的討論衝突(Forbes, et al., 2009)，是不盡相同的。先前的研究證實個人主義文化的成員比集體主義文化的成員較少使用迴避策略(avoiding facework)，較常使用競爭的面子策略(dominating facework)；個人主義文化呈現衝突的方式較直接，集體主義文化呈現衝突的方式較迂迴 (Oetzel, Ting-Toomey & Masumoto, 2001)。

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也建議，因為迴避策略可以讓自己在爭論過程免於受傷，因此迴避是一種同時保護自己、對方與彼此面子的衝突因應策略；而且，迴避策略較常於發生在集體傾向的個體(Oetzel, Myers, Meares & Lara, 2003)。換言之，背後批評可以作為一種迴避正面衝突的策略，目的是用來維護自己、對方或彼此的面子，可能發生在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的文化，只是發生在集體主義文化的機率較高。因此，本研究第一個假設為

H1: 在同儕的互動中，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大學生比個人主義文化的大學生更常使用背後批評。

#### 四、背後批評的原因

根據 Brown 與 Levinson(1987)，為了減少批評所帶來的、施加於被批評者的負擔，批評者會盡量以禮貌的方式來表達批評的行為；而最禮貌的方式，莫過於不在當事者的面前做批評的行為(do not perform the act)。不當面批評是一種迴避正面衝突的衝突因應策略，面子協商理論稱之為迴避策略(avoiding facework)。根據面子協商理論，迴避策略是因

為人際關係的考量而選擇不公開衝突(Oetzel, Ting-Toomey & Masumoto, 2001; Ting-Toomey & Kurogi, 1998)。尤其是在強調和諧與在乎關係的社會，因為害怕公開衝突的後果(Forbes, et al., 2009; French, et al., 2002)，背後批評行為因而成為促進和諧與團體穩定的手段之一(French, et al., 2002)。研究指出，間接攻擊行為跟獲得同儕好感有關；而且，不管對男生或是女生來說，使用間接攻擊會助長同儕的接納，可以讓自己在團體的關係更好(王明傳、雷庚玲，2007)。因此，背後批評的第一個原因可能是為了建立關係(王明傳、雷庚玲，2007; Archer & Coyne, 2005; French et al., 2002)。

除了關係的考量，學校生活的人際相處有時會有同儕排斥現象，也因受同儕排斥而導致間接攻擊行為的出現(王明傳、雷庚玲，2007)。遭排斥的人會想在同儕關係的挫敗中做些彌補，或是藉此報復讓自己難堪的同儕，而試圖採取攻擊行動來報復對方；但公開攻擊的行為容易被發現，間接攻擊行為因此萌生(王明傳、雷庚玲，2007)。學校生活的同儕互動，主要以小團體為主，團體之間的界線也會劃分清楚(楊國樞、張春興，1990)。為了避免被同儕排斥，會遵守共同訂定的團體規範，對同儕的看法特別重視；因此在人際關係的發展過程，同儕影響的力量也特別大(楊國樞、張春興，1990)。王明傳與雷庚玲(2007)的研究發現，學童會利用同儕關係，進而讓同儕無法參與活動，不能融入團體生活。對大學生而言，可以經由背後批評破壞對手的積極面子(positive face)，令其得不到別人的贊同、喜愛、欣賞和尊敬。同儕關係涉及團體接納或排斥的程度，接受度高表示受到喜愛與歡迎；反之，則是被忽略、拒絕或疏離(鄭芬蘭、楊晴閔、黃秋華，2008)。因此，如果不加入背後批評的行列，也擔心自己可能會成為下一個被攻擊的對象(French, et al., 2002)。因此，背後批評的第二個原因可能是怕被同儕排擠(王明傳、雷庚玲，2008)。

Underwood(2003)提出一套行為型式的理論模型將間接攻擊的花招歸類成「關係操弄」、「社會排擠」與「散播謠言」。所謂「關係操弄」是操弄攻擊者與某一同伴之間的關係；例如，揚言威脅要終止彼此的友

誼關係、故意冷落或故意不理會同伴。在王明傳與雷庚玲(2008)的研究，受試者在接受「間接攻擊反應評鑑」的結果顯示，「馬上跟他斷絕往來，再去認識、結交別的朋友，讓他少個朋友」的選項最受青睞。讓他人少個朋友，多個朋友，也就是意味著可以建立自己龐大的人脈，操控整個團體的同儕網絡。Björkqvist (1994)將這類的間接攻擊(Indirect aggression)定義為一種在背地裡傷害他人的低代價攻擊行為。攻擊者可以以不公開的流言蜚語(gossip)來傷害對手的名譽，令其被排擠在團體之外，藉此來達到控制人際關係的目的，以便讓自己在團體中占有人際關係的優勢(Archer & Coyne, 2005)。換言之，背後批評的第三個原因可能是為了掌控關係的主導權。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是

H2: 在同儕的互動中，大學生背後批評的程度會與建立關係、怕被同儕排擠，以及掌控主導權的程度呈正相關。

## 五、文化與背後批評的原因

根據禮貌理論(Politeness Theory, Brown & Levinson, 1987)，批評是一種高度威脅對方顏面與自尊的言語行為(speech acts)；因此，批評者會傾向於採用各式各樣的策略來保留被批評者的面子；而不同的文化採用不同的批評策略。在集體主義的文化因為重視社會的和諧，以關係為取向，正面衝突被認為是不合宜的(Hwang, 2000)，不夠世故的，所以難以解決問題(French, et al., 2002)。因此在集體主義的文化社群裡，間接的攻擊行為，尤其是背後的閒話批評，較常被用在人際衝突與關係惡化時(French, et al., 2002)。因為在他人背後的閒話批評之類的關係攻擊，往往可以讓團體的情感更親密(French, et al., 2002)。背後批評就是在衝突對手不知情的情況下，在第三者面前執行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face threatening acts)。因此，背後批評策略其實是類似，但更勝於禮貌理論(Brown & Levinson, 1987)所謂的「間接執行威脅面子(go off-record)的禮貌策略」。背後批評的目的是維護表面的關係和諧，擔心破壞同儕的友誼關係，會由自己人變成外人。因為集體主義文化的成員會以明顯不同的標準對待自己人與外人(Hofstede, 1983; Triandis, 1995)。反觀個人主義文化，因為以個人為中心，強調自主性與關係對等(Hofstede, 1983;

Triandis, 1995), 更以不牽涉個人情感為原則(陳凌, 2005), 因此公開、理性的討論衝突是社會規範所允許的, 因而背後的閒話批評之類的關係攻擊也較少見(Forbes, et al., 2009)。因此, 本研究的第三個假設為

H3: 在同儕的互動中, 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大學生比個人主義文化的大學生更傾向於利用背後批評來建立關係。

集體主義文化強調的是和諧的人際關係, 以及對團體的忠誠與投入, 通常這種文化的人際關係發展傾向於長期關係(Hofstede, 1983; Triandis, 1995)。同儕的和諧相處更是被視為理所當然, 所以正面的衝突是被認為不恰當的(Forbes, et al., 2009; French, et al., 2002)。對集體主義文化的人而言, 必須依附團體而生活, 團體提供個人保障與安全感, 被排擠在團體之外會是很嚴重的懲罰(French, et al., 2002)。反之, 個人主義文化則以個人目標為重, 人際關係發展也是傾向短期關係, 所以當衝突產生時, 可以接受面對面的解決方式(Forbes, et al., 2009; French, et al., 2002)。因此, 第四個研究假設為

H4: 在同儕的互動中, 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大學生比個人主義文化的大學生更傾向於利用背後批評來避免被同儕排擠。

由於集體主義文化傾向於父權主義, 在傳統上, 家庭的權利是掌控在最長的男性手上, 年輕人的情感, 也因此表現的比較壓抑(Toldos, 2005)。當衝突出現時, 也可能壓抑下來, 尋求檯面下的解決方式。同時, 如果不加入批評的行列, 個體也會因為害怕自己成為被攻擊的目標; 因而, 背後批評便成為控制他人行為的手段(French, et al., 2002)。反觀個人主義的文化, 強調個人平權性與平等性(Hofstede, 1983; Triandis, 1995), 衝突發生也會當面溝通解決(Forbes, et al., 2009), 經由面對面的溝通達到操控關係的目的。因此, 第五個研究假設為

H5: 在同儕的互動中, 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大學生比個人主義文化的大學生更傾向於利用背後批評來掌控主導權。

##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自陳問卷調查法(self-report questionnaire)，比較來自集體主義文化與個人主義文化的人，使用背後批評與產生背後批評原因的差異程度。研究共有三個變項，文化、背後批評行為，以及背後批評的原因。

### 一、測量工具的設計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文化，測量的方式是依照 Hofstede(2001)對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文化調查結果的國家排列來區分受試者所屬的文化。本研究共採用兩個自編封閉式量表，用來測量兩個依變項，背後批評行為，以及產生背後批評行為的三個原因，建立關係、怕被同儕排擠、以及掌控主導權。

#### (一)背後批評行為量表的設計

本研究採用研究者自行編製的量表來測量背後批評行為。此量表的情境是設定在大學生做團體作業的衝突，關係是對等的同儕關係。這是大學生最常面臨的人際互動問題。情境是在某一門課，老師指定的一個小組作業。作業成績的評量採團體制，也就是每個人都得到相同的組成績。做小組作業時，有一位同組的成員「甲」對作業沒有貢獻，最後卻和全組人獲得相同的成績。量表的題目詢問團體成員是否會因此而出現背後批評這位同學「甲」的行為。量表的題目編製過程是參考 Björkqvist, Lagerspetz 與 Kaukiainen (1992)對青少年所設計之關係攻擊行為量表(Direct & Indirect Aggression Scale, DIAS)，有關背後批評的題目內容，共編製 7 題。(見附錄 1)

#### (二)背後批評原因量表的設計

本研究採研究者自行編製的量表來測量導致背後批評行為的三個原因，建立關係、怕被同儕排擠與掌控主導權。編製過程是參考藍珮君(2005)所研製的「學生社交行為量表」的編製方式，共編製了24題。第1~9題是「建立關係量表」。第10~16題是「怕被排擠量表」。第17~24題

是「掌控主導權量表」。(見附錄2)

所有的量表測量以 Likert 六點記分，1 分表示「完全不可能發生」，6 分表「非常有可能發生」來計算其程度。在量表設計完成之後，加入性別、年齡與國籍等人口變項，組成一完整問卷。

## 二、前測(Pilot study)

在問卷設計完成後，先進行前測來檢驗測量工具的信度。本研究以便利取樣的方式，在臺灣一所小型大學尋求自願的受訪者。總共發放 100 份中文問卷，經由剔除無效問卷，得到有效問卷 96 份，有男性 46 人，女性 50 人，皆為大學部三至四年級的學生。平均年齡為 22.3(SD=2.45) 歲。問卷發放過程是由研究者徵詢自願者，在教室內當場填寫完畢後回收。問卷填寫進行的時間約 5 至 10 分鐘。

問卷收集完成之後，以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X (SPSS-13.0 英文版)對「背後批評行為量表」與「背後批評原因量表」分別進行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與項目分析(item-analysis)。因素分析的步驟是先以 KMO 值 0.70 以上，Bartlett 球形檢定顯著為標準，來確定量表是否符合進行因素分析的前提。接著以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萃取因素，然後以最大變異法(Varimax)來做因素轉軸。

初步的因素分析與項目分析結果顯示，須經由刪除負荷值與相關值過低的題目來改善因素的負荷值與內部一致性信度的 Cronbach  $\alpha$  值。經由刪除第 4 與第 5 題之後，「背後批評行為量表」的  $\alpha$  值是 0.79，共剩下 5 題。「背後批評行為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KMO 值為 0.78，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著。量表共有 5 個項目萃取出負荷量在 0.5 左右的一個因素，可以解釋 57.90%的變異量。(見表 1)

表 1. 「背後批評行為量表」的因素分析(pilot study)

	Component
	1
背後批評3	.909
背後批評2	.855
背後批評1	.841
背後批評4	.651
背後批評5	.457

刪除第4與第9題之後，「建立關係量表」 $\alpha$ 值為0.94，共剩7題。刪除第12與第16題之後，「怕被排擠量表」的 $\alpha$ 值為0.94，共剩5題。刪除第17、18與第22題之後，「掌控主導權量表」的 $\alpha$ 值為0.91，共剩5題。(見表2)

表 2.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值(pilot study)

變項		Cronbach $\alpha$	題數
背後批評行為		0.79	5
背後 批評 的原因	建立關係	0.94	7
	怕被排擠	0.94	5
	掌控主導權	0.91	5

刪題之後的「背後批評原因量表」總共有17題。因素分析結果顯示KMO值為0.91，Bartlett球形檢定達顯著。共萃取出三個負荷值都在0.5以上的因素，可以解釋77.12%的變異量。(見表3)

表 3. 「背後批評原因量表」的因素分析(pilot study)

	Component		
	1	2	3
建立關係4	<b>.847</b>	.319	.190
建立關係2	<b>.830</b>	.137	.181
建立關係3	<b>.820</b>	.180	.251
建立關係1	<b>.794</b>	.196	.070
建立關係5	<b>.710</b>	.367	.321
建立關係7	<b>.704</b>	.518	.115
建立關係6	<b>.628</b>	.487	.345
怕被排擠8	.299	<b>.829</b>	.199
怕被排擠9	.321	<b>.796</b>	.295
怕被排擠11	.249	<b>.741</b>	.449
怕被排擠10	.335	<b>.730</b>	.306
怕被排擠12	.274	<b>.726</b>	.475
掌控主導權16	.184	.132	<b>.886</b>
掌控主導權15	.091	.226	<b>.796</b>
掌控主導權14	.209	.482	<b>.754</b>
掌控主導權13	.373	.357	<b>.712</b>
掌控主導權17	.249	.408	<b>.639</b>

### 三、樣本

依據前測的結果修正測量工具之後，將中文問卷翻譯成英文，以利於中文不佳的外籍人士填答。英文的問卷經由兩位雙語的傳播學者作表面效度評估，修改後使用。問卷修改完成之後，以便利取樣的方式，透過台灣的大學與大學附設的華語文中心尋求不同國籍的大學生，以自願的方式邀請受試者參與問卷填答。問卷的發放時間為 2012 年的 1 月至 2013 年的 6 月。問卷發放是由研究者徵詢自願者，於下課後，在教室門口或是教室內當場填寫完畢後回收，共得 261 份問卷。



問卷收集完成之後，根據 Hofstede(2001)的個人主義特質的國家排行將受試者歸類為來自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文化的兩組樣本。Hofstede(2001)調查 53 個國家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文化特質傾向。因為調查排名是採兩極化的方式，排名第一的國家是個人主義的文化特質最明顯，排名第五十三的國家則是集體主義的文化特質最明顯。也就是說，排名中間的國家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文化特質不明顯的國家。因此本研究只採用來自典型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文化的代表樣本。也就是剔除來自排名第十六至第四十國家的受試者。將來自排名第一至第十五國家的受試者歸類為個人主義文化的代表樣本，來自排名第四十一至第五十三的國家的受試者為集體主義文化的代表樣本。

最後，經由剔除非大學生的樣本，來自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文化特質不明顯國家的樣本，以及填答不清楚的問卷，共得有效問卷 202 份。202 位受試者中，來自個人主義國家的受試者共有 83 位，而集體主義國家共有 119 位。為了平衡集體與個人主義文化的受試者人數，於 2014 年 4 月再次發放問卷，追加個人主義國家的樣本。最後共得有效問卷 212 份。受試者的平均年齡為 22.07(SD=1.98)歲，共有男性 107 人，女性 105 人，皆為大學部一至四年級的學生。在 212 位受試者中，來自個人主義國家的受試者共有 93 位，包括美國 21、澳洲 18、法國 14、德國 12、加拿大 11、英國 10、荷蘭 2、瑞典 2、挪威 2、以及瑞士 1 位；而集體主義國家共有 119 位，包括台灣 84、印尼 8、巴拿馬 4、馬來西亞 4、香港 5、韓國 5、日本 8，以及泰國 1 位。

## 肆、研究結果

### 一、初步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X (SPSS-13.0 英文版)進行資料分析。首先將「背後批評行為量表」與「背後批評原因量表」分別進行因素分析。「背後批評行為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KMO 值為 0.82，Bartlett 球形檢定達顯著。量表共有 5 個項目，萃取出一個負荷量在 0.5 以上的因素，可以解釋 67.60%的變異量。(見表 4)

表 4. 「背後批評行為量表」的因素分析

	Component
	1
背後批評3	.918
背後批評2	.860
背後批評4	.812
背後批評1	.810
背後批評5	.695

「背後批評原因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KMO值為0.91，Bartlett球形檢定達顯著。量表共有17個項目，萃取出三個負荷量在0.5以上的因素，可以解釋75.18%的變異量。(見表5)

項目分析(item-analysis)結果顯示，「背後批評行為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alpha$ 值為0.82(中文版)與0.81(英文版)。「背後批評原因量表」共有三個分量表，「建立關係」的Cronbach  $\alpha$ 值為0.93(中文版)與0.87(英文版)，「怕被排擠」為0.93(中文版)與0.91(英文版)，「掌控主導權」為0.90(中文版)與0.91(英文版)。(見表6)

表5. 「背後批評原因量表」的因素分析

	Component		
	1	2	3
怕被排擠8	<b>.809</b>	.308	.200
怕被排擠9	<b>.773</b>	.334	.294
怕被排擠11	<b>.771</b>	.200	.368
怕被排擠12	<b>.755</b>	.287	.408
怕被排擠10	<b>.742</b>	.324	.285
建立關係4	.320	<b>.824</b>	.243
建立關係2	.193	<b>.818</b>	.190
建立關係1	.108	<b>.796</b>	.118
建立關係3	.294	<b>.772</b>	.223
建立關係5	.452	<b>.671</b>	.280
建立關係7	.563	<b>.629</b>	.096
建立關係6	.480	<b>.616</b>	.333
掌控主導權16	.158	.233	<b>.864</b>
掌控主導權15	.230	.125	<b>.805</b>
掌控主導權14	.490	.187	<b>.728</b>
掌控主導權13	.374	.370	<b>.685</b>
掌控主導權17	.502	.242	<b>.565</b>

表 6. 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值

變項	Cronbach $\alpha$ 值		題數
	中文版	英文版	
背後批評行為	0.82	0.81	5
建立關係	0.93	0.87	7
怕被排擠	0.93	0.91	5
掌控主導權	0.90	0.91	5

## 二、檢驗研究假設

研究所得的資料以皮爾森相關(Pearson Correlation)與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Sample t-test)來檢驗五個研究假設。

假設 H1 預測集體主義文化的成員較個人主義文化的成員更常使用背後批評。t 檢定結果呈現顯著差異，假設 1 成立。集體主義文化(M=4.39, SD=0.96)比個人主義文化(M=2.95, SD=1.00)的受試者更傾向於使用背後批評[t<sub>(210)</sub>=10.61, P < 0.01]。(見表 8)

假設 H2 預測背後批評的程度會與建立關係、怕被同儕排擠、以及掌控主導權的程度呈正相關。皮爾森相關檢測結果證實假設 2 成立。背後批評的程度越高，建立關係(r=0.53, P < 0.01)、怕被同儕排擠(r=0.56, P < 0.01)、以及掌控主導權(r=0.57, P < 0.01)的程度也越高。(見表 7)

表 7. 背後批評行為與背後批評原因之皮爾森相關分析

		背後批評行為
背後批評原因	建立關係	0.53**
	怕被排擠	0.56**
	掌控主導權	0.57**

\*\* 是顯著值為 0.01 (雙尾)

N=212

假設 H3 預測集體主義文化的成員較個人主義文化的成員更傾向於利用背後批評來建立關係。t 檢定結果呈現顯著差異，假設 3 成立。集體主義文化(M=3.76, SD=1.20)比個人主義文化(M=2.58,SD=0.89)的受試者更常利用背後批評來建立關係[t<sub>(210)</sub>=7.90, P < 0.01]。(見表 8)

假設 H4 預測集體主義文化的成員較個人主義文化的成員更傾向於利用背後批評來防止被同儕排擠。t 檢定結果呈現顯著差異，假設 4 成立。集體主義文化(M=3.83,SD=1.33)比個人主義文化(M=2.49,SD=1.08)的受試者更常因為怕被同儕排擠而使用背後批評[t<sub>(210)</sub>=7.84, P < 0.01]。(見表 8)

假設 H5 預測集體主義文化的成員比個人主義文化的成員更傾向於利用背後批評來掌控主導權。t 檢定結果顯示呈顯著差異，假設 5 成立。集體主義文化(M=3.82,SD=1.08)比個人主義文化(M=2.44,SD=1.15)的受試者較常使用背後批評來掌控主導權[t<sub>(210)</sub>=9.02, P < 0.01]。(見表 8)

表 8. 獨立樣本 t 檢定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背後批評	集體主義: 4.39	0.96	10.61**
	個人主義: 2.95	1.00	
建立關係	集體主義: 3.76	1.20	7.90**
	個人主義: 2.58	0.89	
怕被排擠	集體主義: 3.83	1.33	7.84**
	個人主義: 2.49	1.08	
掌控主導權	集體主義: 3.82	1.08	9.02**
	個人主義: 2.44	1.15	

\*\* 是顯著值為 0.01 (雙尾)

N=212，其中集體主義N=119；個人主義N=93。

## 伍、討論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檢驗文化差異對背後批評行為的影響。五個研究假設均得到數據的支持。大致而言，研究結果證實文化確實會影響個人的背後批評行為。來自這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學生對於使用背後批評的程度有顯著的差異。而大學生在背後批評同儕的三個原因，建立關係、避免被排擠，以及掌控關係主導權，與其背後批評的行為有顯著正相關。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人會比個人主義文化的人更常因為這三個原因，而有背後批評行為的產生。

### 一、文化與背後批評

研究結果證實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大學生，使用背後批評的程度顯著高於個人主義文化的大學生。這方面的結果大致支持先前間接攻擊行為的研究，以學齡期與青少年前期為樣本的研究發現。這顯示不論是在學齡期、青少年的前期或是大學階段，在集體主義文化的學生都較傾向於選擇間接攻擊來處理同儕的人際衝突。在人際衝突時，以背後批評的方式間接攻擊對手，既可以保護自己，避免關係惡化，又可以達到宣洩情緒與傷害對方的目的。對於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人而言，這可能是為維持檯面上和諧不得已的選擇。

研究數據也證實了背後批評行為和建立關係、怕被同儕排擠、以及掌控主導權有顯著的相關性。此結果也大致支持過去研究的推論，雖然背後批評行為可能發生在所有的文化，但是研究證實此種行為是比較普遍存在於集體主義文化的社會(Forbes, et al., 2009)。換言之，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大學生使用背後批評的可能性是顯著高於個人主義文化的大學生。這些研究發現也間接的支持了面子協商理論(Ting-Toomey, 2005)的主張，背後批評可以作為一種衝突迴避的策略(avoiding facework)，用來維護或保留自己(self-face)、對方(other-face)或彼此的面子(mutual-face)。相較於其他的間接關係攻擊行為，背後批評是比較溫和、保留對方與雙方面子的衝突因應策略(facework)，可能因而受到了來自集體主義文化學生的喜愛。

研究發現也間接的支持了禮貌理論(Brown & Levinson, 1987)的主張，不同的文化採用不同的批評策略，來保留被批評者或批評者的面子。對於集體主義者而言，最好的禮貌策略可能莫過於不要當面批評。而這種策略相近於 Brown 與 Levinson(1987)所提的五種策略之一，「不實行威脅顏面的行為(don not do the face-threatening act)」。以細緻度與層次而言，背後批評的策略是更勝於「不實行威脅顏面行為」的策略。從文化的情境而言，集體主義的文化，尤其是受儒家五倫影響的文化(例如中國、台灣、日本、韓國)，是階級的社會結構，強調人際階級與和諧；因此，禮是受制於社會階級與和諧，批評行為通常只允許上對下的不對等關係(Min, 2008)。換言之，批評的言語行為(speech acts)用於同儕的關係並不適宜，也就是違反了禮儀規範。當衝突的議題是違反公平正義，不滿的情緒不得不發的情況，在被批評者的背後做批評的言語行為，至少可以避免身份不當而失禮，同時又可以維持台面上的和諧。這也可能是背後批評行為在集體主義的文化可以被容忍，甚至被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個人主義文化強調平權，盡量縮減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Hofstede, 1983；Triandis, 1995; Min, 2005)，鼓勵個人說出自己的想法;因此，批評是建立在法律、公平正義(Min, 2005)與理性(Forbes, et al., 2009)之上。換言之，個人主義文化的社會規範有比較大的空間，可以允許以理性的批評，為自己的權益辯護，或是表達不滿；因而，需要在背後批評他人的機會也相對的較少。

衝突是人際互動與關係建立過程無法避免的。對於西方的個人主義文化而言，以批評來因應這種棘手的人際衝突問題，可能是要研究如何經由增加言語動作的禮貌程度來減輕批評行為對被批評者尊嚴的威脅，以符合社會禮儀規範的要求。因此，禮貌理論(Brown & Levinson, 1987)受到西方學者的青睞。然而，對集體主義文化的人而言，可能必須使用更細緻、更高層次的策略才得以避免批評言語行為的傷害。因此，背後批評行為因應而生。總而言之，背後批評是一種間接反擊的衝突因應策略，發展於重視集體和諧、人際網絡緊密與階級明顯的社會結構。就如過去的研究所建議的，間接攻擊者可以隱藏在人群中不被發現(王孜甯, 2008)，也很難被察覺出來(Toldos, 2005)。對於重視顏面與關係的

集體主義文化而言，在檯面上保留對方的面子是很重要的，撕破臉了，關係也就瓦解了。尤其是對於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大多數受試者，台灣大學生而言，同儕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台灣社會，人際關係的發展是傾向於建立長期關係，大學時代的同儕會是將來進入職場的人際網絡。因此，面臨複雜的人際衝突難題時，往往必須參與背後批評的行列，目的是為了維護關係，避免被排擠在群體之外，藉以鞏固自己在團體的地位。

##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未來研究

雖然本研究的測量工具設計與問卷收發過程經過嚴謹的控制，但是受到自陳問卷與樣本代表性的限制，因而至少有五點難以避免的缺失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內、外在效度。

一、本研究以便利取樣，因此樣本的代表性受到了限制。而且研究對象為大學學生，這樣的情形可能限制了研究結果推論到其他母群的能力。因而這些因素可能影響本研究的外在效度。

二、英文問卷的語意因為翻譯的關係，無法避免的，可能與原中文問卷有些微出入，而影響研究結果。

三、自陳(self-report)會產生系統認知偏頗的情形，例如「歸因錯誤」。受試者在填寫問卷時，可能會誇大解釋對象的負面行為，而縮小解釋自己的負面行為，例如，將自己在背後批評對方的行為解釋為理性的討論。

四、自陳可能使受試者無法正確的回憶過去，因為自陳的關係容易將事情合理化，或是簡單化背後批評行為。因此這些限制可能影響本研究的內在效度。

五、不論是「背後批評行為量表」或是「背後批評行為的原因量表」，以自評的方式填答，都可能遇到「社會讚許性」的問題。一般而言，受試者在批評行為量表或是批評行為之因素量表的測量中，可能會不願意承認自己會有背後批評的行為，例如，類似「在背後說一些對對方不滿



的話」。建議未來研究能夠同時以自陳和他評兩種方式同時進行，可能比單獨只使用自陳或他評更加客觀。例如，題目設計可以讓受試者評估互動對方的批評行為。縱使有些自評問卷與樣本代表性所帶來的，難以避免的問題，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均具有相當高的信效度，而數據也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結果也支持了理論與先前的研究發現。

雖然許多先前的研究發現間接攻擊行為存在著性別差異，但是本研究的數據顯示，不論是集體主義或是個人主義文化的男女受試者，在背後批評行為與背後批評三個原因的得分並沒有呈現顯著的不同。可能的原因是，間接攻擊行為的性別差異呈現在質，而不是量(Björkqvist, 1994)。本研究的量表內容所測量的是背後批評行為出現的頻率，因而無法檢視質的差異。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發現。如果男女大學生以背後批評因應同儕衝突的程度沒有差異，未來的研究可以檢視男性與女性在背後批評的方式上是否呈現差異。

### 三、研究貢獻

本研究的結果可以提供個人、教育與學術界在實務與理論的應用。綜而言之，本研究的貢獻有下列四點。

一、本研究的結果可以填補國內外間接攻擊行為研究的缺口與不足。間接攻擊行為是一種多面向的構念，例如散布謠言與背後批評兩種間接攻擊行為就有其方法上與程度上的不同。截至目前為止，過去國內外的研究並沒有將間接攻擊行為的展現方式區分開來探討。也可能因此而導致研究結果的不一致，例如有些研究發現間接攻擊行為呈現性別差異(e.g., Crick & Grotpeter, 1995；王明傳、雷庚玲，2007)，而有些研究卻發現沒有性別差異存在(e.g., Toldos, 2005)。

二、本研究提供了初探性的證據，分析導致背後批評行為的原因。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外並沒有研究直接探討背後批評行為的原因。了解學生使用間接攻擊行為的目的，有助於防微杜漸，提早對高危險群學生的攻擊行為做介入，也有利於早期介入效果的評估與衡鑑。

三、透過本研究的結果，可以讓每個個人能更了解生活中的背後批評行為，有利於提升個人因應人際關係惡化的問題。也有助於分析批評者與被批評者的心理狀況，避免個人成為被排擠與霸凌的對象。

四、本研究提供更進一步的證據確認集體/個人主義的文化差異層面有助於解釋背後批評行為。過去對關係攻擊行為的跨文化研究，多數是以比較個別國家的文化差異為探討方向(e.g., Toldos, 2005; French, et al., 2002; Forbes, et al., 2009)。本研究擴大國家數，以許多典型的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國家的樣本來檢視兩種文化在背後批評行為的差異，提供更進一步的證據支持Hofstede (1983; 2001)的文化差異層面理論。

背後批評是一種比較溫和的間接關係攻擊行為，可能受到各種人格特質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所接受。然而研究結果說明了，一個文化對背後批評喜愛的程度可能更勝另一文化。相較於學齡期與青少年前期的學生，大學生因為心智與語言的能力較成熟，因此大學生可能也比較常面對背後批評行為。人際衝突是生活當中無可避免的，因此難免需要面臨背後批評的情況。本研究提供了初探性的證據，分析背後批評行為的原因，以及文化與背後批評的關聯。希望有助於未來的研究能更進一步探討集體主義/個人主義以外的文化差異層面，例如權力距離、不確定性容忍度、陽剛文化/陰柔文化，與背後批評行為的關連，並且將此研究議題延伸到大學生以外的社群，以及不對等的關係。

## 參考文獻

- 王明傳、雷庚玲(2008)。〈華人青少年前期兒童之間接攻擊行為的反應評鑑與情緒經〉。《中華心理學刊》，50(1):71-90。
- 王明傳、雷庚玲(2007)。〈青少年前期的間接攻擊行為:同儕估計法的建構效度〉。《中華心理學刊》，49(2):205-224。
- 王孜甯(2008)。《情境式關係攻擊量表》的發展-成年初顯期之關係攻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江承曉、沈姍姍、林香寶、林文森(2000)。〈南區大專生壓力調適行為與身心健康狀況之相關研究〉。《嘉南學報》，26:54-69。

- 林君徽(2006)。《國小高年級學童間接攻擊與自我概念之探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庭與發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唐雅琳(2009)。《大學生關係攻擊中真實受害經驗之探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素秋(2009)。《國小學童同儕關係與攻擊行為之相關研究》。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黃玉(2000)。〈大學生事務的理論基礎-台灣大學生心理社會發展之研究〉。《公民訓育學報》，9:161-200。
- 黃曬莉(2005)。〈人際和諧與人際衝突〉。見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黃松林、鄭淑琪、黃美瑀(2005)。〈青少年同儕團體與行為困擾之相關研究-以屏東縣內埔鄉某國中為例〉。《台灣社會發展研究學刊》，6:78-79。
- 楊國樞、張春興(1990)。《兒童心理學》。台北:桂冠。
- 劉玉華(2004)。〈以全人教育觀點來看大學生壓力源及因應模式〉。《實踐通識論叢》，2:65-82。
- 鄭芬蘭、楊晴閔、黃秋華(2008)。〈兒童馬基人格、人際欺騙與同儕關係〉。《花教育大學學報》，27:133-159。
- 藍佩君(2005)。《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行為及意圖歸因、友誼品質、自我概念之相關研究》。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論文。
- Archer, J., Coyne, S. M. (2005). An integrated review of indirect, relational, and social aggress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9(3), 212-230.
- Björkqvist, K. (1994). Sex differences in physical, verbal,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Sex Roles*, 30, 177-188.
- Björkqvist, K., Lagerspetz, K. M. J., & Kaukiainen, A. (1992). Do girls manipulate and boys fight?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regard to direct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18, 117-127.
- Brown, P., & Levinson, S. 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n, S. (2008).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of speech act of criticism in Chinese and English. *US-China Foreign Language*, 6(3), 74-77.
- Crick, N. R. (1996). The role of overt aggression, relational aggress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in the prediction of children's future soci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67, 2317-2327.
- Crick, N. R., & Grotpeter J. K. (1995). Relational aggression, gender,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66, 710-722.
- Forbes, G., Zhang, X., Doroszewicz, K., Haas, K. (2009).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gender, and direct or indirect aggression: a study in China, Poland, and the US. *Aggressive Behavior*, 35, 24-30.
- French, D. C., Jansen, E. A., & Pidada, S. (2002). United States and Indonesian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reports of relational aggression by dislike peers. *Child Development*, 4, 1143-1150.
- Hahn, J., & Hatfield, H. (2011). Group face i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ndividual and the group. *Multilingua*, 30, 25-70.
- Hwang, K. K. (2000). Chinese relationalism: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30(2), 155-178.
- Hofstede, G. (1983). National cultures in four dimensions a research-based theor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mong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s*, 13(1-2), 46-74.
-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Kaukiainen, A., Lagerspetz, K. M. J., Björkqvist, K. (1992). Do girls manipulate and boys fight?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regard to direct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18, 117-127.
- Lagerspetz, K. M. J., Björkqvist, K., Peltonen T. (1988). Is indirect

- aggression typical of females? Gender differences in aggressiveness in 11 to 12-year-old children. *Aggressive Behavior*, 14, 403-414.
- Mao, L. R. (1994). Beyond politeness theory: 'Face' revisited and renewed. *Journal of Pragmatics*, 21(5), 451-486.
- Oetzel, J., Ting-Toomey, S., Tomoko, M., Yumiko, Y., Xiaohui, P., Jiro, T., Richard, W., et al. (2001). Face and facework in conflict: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German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8(3) , 235-258.
- Oetzel, J., Myers, K.K., Meares, M., & Lara, E. (2003). Interpersonal Conflict in Organizations: Explaining Conflict Styles via Face-Negotiation The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20( 2), 106-115.
- Toldos, M. P. (2005). Sex and age differences in self-estimated physical, verbal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in Spanish adolescents. *Aggressive Behavior*, 31, 13-23.
- Ting-Toomey, S. (1988). Intercultural conflict styles: A face-negotiation theory. In Y. Y. Kim & W. Gudykunst (Eds.), *Theor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 213–235). Newbury Park, CA: Sage.
- Ting-Toomey, S. (2005). The Matrix of Face: An Updated Face-Negotiation Theory. In W. B. Gudykunst,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Ting-Toomey, S., & Kurogi, A. (1998). Facework competence in intercultural conflict: An updated face-negoti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2, 187–225.
- Ting-Toomey, S., & Oetzel, J. G. (2001). *Managing intercultural conflict effectivel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Triandis, H. C. (1995).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Underwood, M. K. (2003). *Social aggression among girls*. New York: Guildford Press.
- Vail, K. (2002). Relational aggression in girl. *American School Board*

*Journal*, 189, 14-18.

Yuan, X. (2013). Face revisited--Negative face wants in Chinese culture.

*China Media Research*, 9(1), 90-100.

Warren, P., Richardson, D. S., & McQuillin, S. (2011). Distinguishing among nondirect forms of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37,

291-301.

## **The Effect of Culture on Malicious Gossip Behavi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Individualist and Collectivist Cultures**

Pao-Hsing Chung, Pei-Ya Chung,  
& Chuan-Chuan Cheng

---

### **Abstrac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s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resulting in stress on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major causes of stress comes from interpersonal conflict in college life. Culture is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in determining what kind of relational aggression an individual will choose in coping with interpersonal conflict. Malicious gossip is a commonly used of relational aggression in dealing with conflict in college lif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culture on the behavior of malicious goss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cultures.

There were two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developed to measure the behavior of malicious gossip, and its three contributing causes. Snow-ball and convenient sampling were chosen to recruit respondents from college campuses and foreign language center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mong 212 participants, 119 were from collectivist cultures, and 93 from individualist on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culture indeed affects individuals' attitudes toward malicious gossip. Malicious gossip occurred significantly more often in collectivist cultures than in individualist ones. The reasons of involving in malicious gossip were to establish relationship, to avoid being excluded

from a group, and to control relationship in group. Collectivist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often than individualists involving in malicious gossip for the reasons of establishing relationship, avoiding to be excluded from a group, and controlling relationship in group. Based on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indirectly provided evidence to support Politeness Theory and Face Negotiation Theory.

**Key words:**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interpersonal conflict, malicious gossip, indirect aggression, politeness theory, face negotiation theory



附錄：

附錄1.「背後批評行為量表」的題目

請問這些情形是否曾經發生在您或周圍的人身上？ 請依您個人的經驗來回答下列問題：	修訂後題號
1. 同組組員會在背後說一些對甲不滿的話。	1
2. 同組組員會在背後批評甲的行為，讓甲的形象受損。	2
3. 同組組員會在背後說一些有關甲的不是，讓其他同學知道。	3
4. 同組組員會在背後和同學一起批評甲的髮型和穿著。	預試後刪除
5. 同組組員會在網路上，像是部落格，寫對甲的不滿，然後加密碼只給同一組的人看。	預試後刪除
6. 同組員如果聽到有人讚美甲，會以較懷疑的口吻來回答，例如：「你確定你說的是他？」或者「你應該說錯人了吧！」，讓其他人知道甲的為人。	4
7. 同組組員和其他同學會幫甲取一個甲聽不懂的綽號稱呼及嘲笑甲。	5

附錄2. 「批評行為原因量表」的題目

如果組員會在甲背後作出上述的行為，可能的原因是	修訂後題號
1. 為了和大家有共同的話題。	建立關係 1
2. 為了維繫大家情感。	建立關係 2
3. 為了讓大家都喜歡自己。	建立關係 3
4. 為了和大家有共識。	預試後刪除
5. 為了可以和大家更親。	建立關係 4
6. 為了不失去友誼。	建立關係 5
7. 為了和大家建立情感。	建立關係 6
8. 為了融入大家。	建立關係 7
9. 為了博得大家的好感。	預試後刪除
10. 為了不和甲一樣被大家討厭。	怕被排擠 8
11. 為了怕大家會疏遠自己。	怕被排擠 9
12. 為了合群。	預試後刪除

13. 為了不和甲一樣被大家排擠。	怕被排擠 10
14. 為了不被邊緣化。	怕被排擠 11
15. 為了不被大家忽視。	怕被排擠 12
16. 為了不被疏離。	預試後刪除
17. 為了打擊甲。	預試後刪除
18. 希望得到大家的認同。	預試後刪除
19. 為了凸顯自己在團體的地位。	掌控主導權 13
20. 為了凸顯自己在團體中的優勢。	掌控主導權 14
21. 為了讓大家認同自己的想法。	掌控主導權 15
22. 為了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預試後刪除
23. 為了提升團體中的主導權。	掌控主導權 16
24. 期望大家與自己最要好。	掌控主導權 17